

# 校友通讯

SFLS ER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2018年

创刊号

总第1期

# 献身祖国外交四十年——杨民大使讲座

2018年4月23日，1975届校友杨民，为母校师生做了外交官进校园系列讲座的第一讲“献身外交四十年”。

杨民校友1976年进入外交部工作，曾驻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突尼斯、多哥、马达加斯加等多个国家，他在42年的外交生涯中，为祖国外交事业和中非友好合作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

杨民大使见闻广博，还著有《诗情画意说多哥》《诗情画意绿南宁》等七部著作。



图1 杨民大使做讲座



图2 杨民大使向母校赠送自创的7部著作



图3 校领导与杨民大使合影

# 校友会刊物寄语

浓浓母校情，依依上外心。世纪传承，弦歌永续。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历经55年的历程，桃李满园，薪火相传。历届校友遍及世界各地，为祖国的发展与世界和平默默奉献，以各种方式关注和支持母校的发展。

而今，我们成立的上外附中校友会已成为校友和母校之间的桥梁，是母校、校友和社会合作发展的平台，是每个校友分享成功与喜悦，传递友情和价值的精神家园。在这里我们共同分享，彼此印证，互相激励。

回想学子同窗、数载同舟。弹指一挥间，如今校友们已是工作有业绩，事业有成长，人生有发展的社会栋梁。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学校这55年的发展积淀，离不开广大校友的关心支持和无私帮助。

校友们，母校发展的蓝图已经绘就。相信在校友们的支持下，上外附中的未来将更加美好。为此，我们诚挚地希望广大校友一如既往地关注母校，通过校友会这一平台，为母校的建设建言献策、添砖加瓦。有校友们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母校和广大校友的共同愿景一定会成为现实！

母校兴则校友荣，校友强则母校荣。

亲爱的校友们，让我们携手并肩，奋勇前行，共同创造上外附中更加美好的未来！时光荏苒，光阴似箭。不论历经多少岁月，轮回多少春秋，你们永远都是上外的学子，是永远的SFLSers。愿你们常回来坐坐，常回‘家’看看！

校长 束定芳

2018年4月24日

# 校友通讯

xiao you tong xun



2018年第1期

总第1期

出版日期：2018年5月

主办单位：

上海外国语学校校友会

编委会

主任：崔振嘉

副主任：郑坚敏 赵丙申

编委：朱榄叶 陆忠前 张弘

沈忱 王文嘉

主编：薛万奉

副主编：穆兆左

执编：张康美

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一路295号

邮编：200083

电话：13621801930（赵老师）

13321851917（穆老师）

邮箱：sflsaa@126.com

# MULU 目录

## 卷首语

JUAN SHOU YU

校友会刊物寄语·····1

## 芬芳年华

FENG FANG NIAN HUA

“为母校立纪念石”活动始末····· 3  
夕阳宏日照新天·····4  
我们是祖国的孩子·····6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8  
仿佛未曾离开····· 11  
上外附中教会我的三件事····· 12  
我的附中缘····· 14  
五十年大团圆····· 16

## 外事生涯

WAI SHI SHENG YA

共同构筑二十一世纪的中美关系····· 18  
集世界智慧，促上海发展····· 20  
上外附中成全了我的外交梦·····24

## 筚路蓝缕

BI LU LAN LV

有努力就会有机遇 有机遇就要有奋斗····· 26

## 校友风采

MEI LI FENG CAI

从军之路····· 28  
培养造就新一代公关人才····· 30  
游子 赤子 复兴之子····· 32  
情系上外附中 胸怀中华文化····· 34

为母校立的纪念石 摄影 薛万奉·····封面  
参与立石的同学在竣工的纪念石前留影·····封底  
献身祖国外交40年——杨民大使讲座····· 封2  
75、76届校友返校与老师们相聚····· 封3

# “为母校立纪念石”活动始末

朱榄叶

2013年上外附中50周年校庆期间，66届三个班的一些同学在庆典的舞台上表演了为校庆而写的诗朗诵，得到了广泛好评。校庆活动结束后，同学们感恩母校，纷纷想为母校留下一点纪念。

2014年4月，三(1)班的几个女同学在参观华东政法大学松江校区时，看到校园里华政校友以大树作为送给学校的校庆礼物，受到启发，提议为母校种一棵大树，喻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我便书信与学校协商，后经学校同意，于2015年9月底，由我起草，经与三(2)班薛万奉同学、三(3)班王寅同学讨论、修改，最后定稿为“为母校种树”的倡议书。在微信“上外附中群”里发布，再由各班分别发动。

截止2015年11月底，共收到各班捐款48398.87元，超过一半的校友参与了这次活动。

11月25日，在学校校办林炯老师、后勤管理处的王老师陪同下，我和薛万奉、杨桂玲及王寅同学在上外附中校园内实地查看、落实种树的具体位置。新校舍条件非常好，校园也很整洁漂亮，可惜的是，上外附中的校园实在太小了，造了新大楼之后，已没留下些许空地。从图纸上看，图纸上的所谓空地，也只是没有建筑物而已，几乎都种满了各种树木，还有些地方看上去是空地，实际是地下停车场的入口处。再比如黄山三烈士的塑像，这是学校每年对学生进行校史教育的地方。塑像的周围是67届同学当年入校劳动时种下的樟树，现已有4、5层楼高，胸径也有80多公分了。还有友好学校在新校舍落成时送的7株樱花，也都种在了草坡上，现在树很小，只有5公分直径，围成了两米直径的一个圈，等树长大了，至少要移走5棵，否则根本放不下。校门口的那块空地竖有旗杆，是学校每天升国旗的地方，种树肯定不合适。

经过实地考察，我们几个都觉得没有办法再种大树了。商讨决定，改送一块纪念石，上面刻

字，下面落款“上海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66、67、68届校友敬赠”，并请校友杨洁箴同学书写题字，题字内容由杨洁箴同学自己决定。

2016年3月12日，我和薛万奉、吴汉民三人到松江挑选石头。在一整天的时间里，走了好几处，最后看中了3块石头。薛万奉将这些石头拍照后放在微信群里征询大家的意见。

3月17日，我们三人到附中校园察看立石的具体地点。这才发现，我们原先看中的几个点，地下都是空的（停车库），如将一块3、4吨重的石头长期放置在地下停车库上面，担心会造成下面的建筑结构出现问题，除非能找到停车库的承重柱。最后我们选定了烈士塑像斜对面的草坡。

3月19日，我们三人到松江与合谢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付了定金。随后又带着老板到学校实地查看立石的场地和运石的通道情况。

3月24日，薛万奉再次去松江，将杨洁箴同学书有“使命”二字的题词交与公司。4月25日，立石的刻字完成。

校务会议决定，于5月15日立石于校园内。

5月15日的前一天，天气预报15日有中雨，公司老板打来电话，问是不是要改时间。我查看了精细天气预报，发现预报说15日下午2点开始下雨，便决定仍按原计划进行。15日一早，阳光很好，运石头的车7点半就从松江出发了。薛万奉同学早早到了学校，我和吴汉民、戚红星、杨桂玲同学随之陆续到了学校。校领导对此事非常重视，校办的林老师、总务的王老师等都已到了现场。由于学校花园的路很窄，只能用人工的方法以三根铁棒支撑的架子将三吨多重的石头一点一点向放置石头的坑里移动。10点半，天色突然阴了下来，风也变得凉了，有一点毛毛雨的感觉，还好雨并没有下起来。经过3、4个小时的努力，纪念石终于立好了。

至此，由于66、67、68届同学们的积极参与，使我们在母校留下了感恩的印记。

# 夕阳宏日照新天

## ——再看刘葆宏校长侧记

风依志



前排：刘葆宏校长 后排左起：王东风、陈志军、夏晓菊、赵焕新、庄依众

2017年5月24日——一个初夏时光难得的淡晴天。我们上外附中老三届的初二“风依志”三人组邀两位初一的女生夏晓菊、赵焕新同行，自2015年以来，第三次看望了母校敬爱的首任校长刘葆宏。

夏晓菊是1926年参加革命的“左联”作家，新四军老战士，曾活到105岁的前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的女儿；赵焕新的父亲也是八路军老战士，是“文革”前上海铁路局的第一副局长赵国

栋。她们俩人是当年学西班牙语的同班闺蜜，这次带来了各自的节目，一起看望久违的老校长。

刘校长照例敞开家门迎客。在一阵热烈和久别重逢的招呼声中，我们带着新鲜荔枝、冰糖燕窝、丹麦曲奇、紫云英蜂蜜等礼物相继进入客厅。稍作停顿后，在刘校长诙谐的“节目排练开始”宣布声中启动了第一个节目的排练。

这是一首由庄依众四年前创作，描写上外附中初中部和小学部老三届的1000名“早产儿”

遭遇厄运，不忘初心，矢志奋斗，殊途同归的百行抒情朗诵诗歌《我们是祖国的孩子》。他与赵焕新事先认真排练了5遍，已初见雏形。这次配上陈志军为他们挑选并伴奏的《我的祖国》钢琴旋律，可谓切题切意，情景交融！刘校长逐字逐句地认真倾听，频频点头。夏晓菊除担任报幕外，还义务为陈志军翻动琴架上的诗稿。三次担任摄像的王东风则在一旁专注地搜录下每一个镜头。

一次排练，一次正式摄录朗诵后，刘校长将准备好的人手一碟奶白咖啡蛋糕让大家享用，并聊起母校往事。话题自然从“文革”前后聊到当下。她更多面带微笑倾听大伙儿议论、阐发，不时关切地询问5位学生的目前状况。老校长没有一句提及个人在“文革中”的痛苦遭遇，还是一如以往地表现出豁达、淡定、睿智、从容的学者型教育家特质。

接着，夏晓菊和着钢琴伴奏满怀深情地为老校长和大家演唱了旋律优美的两首民歌《珊瑚颂》和《谁不说俺家乡好》。高亢、圆润的的嗓音和丰富的表情引来了满堂喝彩和刘校长笑眯的双眼！听到自己的学生中有如此美妙的歌喉，她甚感欣慰！是啊！已是儿孙绕膝的花甲学生来看望九旬高龄的耄耋校长，回忆培育之恩，谁说这不是五月艳阳天中最美丽的一道风景呢？



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在陈志军的提议下，大伙儿与刘校长幸福地合了影，依依惜别，相约明年再来探望她老人家。

这正是：**花甲春风承母爱**

**夕阳宏日照新天**

（注：对联中镶嵌刘校长、王东风、赵焕新名字中各一字）

（“风依志”系指王东风、庄依众、陈志军三人组合，王东风、庄依众为上外附中67届英语1班校友，陈志军为上外附中67届西班牙语班校友。）

# 我们是祖国的孩子

——为纪念我的母校上外附中建校50周年而作

庄依众

这是一段尘封的往事：  
1963年，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建立了上外附中。  
从此，上海中山北一路295号  
集合着一群新中国最幸福的同龄人。

在少先队队旗星火火炬的映照下，  
在海军军舰阳光灿烂的甲板上，  
十几岁的少男少女与二十几岁的年轻水兵相  
约——

爱祖国，爱人民，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1966年，我的母校难逃“文革”的浩劫。  
时刻准备着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  
成了共和国最令人痛惜的一千名“早产  
儿”……

本来可以从这所中国最好的学校  
培养出一千个栋梁之材，  
本来可以从一千株高级翻译的苗子成长为  
一千名部长、大使、将军、校长、教授、学者。  
因为他们看到过王汝琪院长讲述的宝塔山下  
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  
因为他们亲历过刘葆宏校长主导的听说领先的  
天天向上；  
因为他们在开林油漆厂失火时得到过石岚书  
记的果断保护；  
因为他们欢呼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

往事将永远历历在目：  
谭文兰老师那目光炯炯的大眼睛，  
Sofka老师那爱我中华的小辫子，

蔡小谢老师那淡定微笑的启蒙教学，  
王惠芳老师那令人惊艳的藏族舞蹈，  
刘志法老师那描绘大庆的爱国情怀，  
彭东霞老师那丝丝入扣的数学逻辑，  
陆钟珏老师那点滴入心的政治教育……

历史将永远不会忘记：  
我班一位女同学幸运地进了北外，  
我从云南边陲给她写信。  
几个月后，我在冰冷的木板床上，  
梦见自己也进了北外，见到了这位同学，  
还有失散多年的其他校友……

什么是世界上最苦涩的梦？  
一千名上外附中的“早产儿”在苦难中做的  
重返母校，升入大学的梦啊！

因为我们在蹉跎岁月中百折不挠，  
因为我们在社会底层中百炼成钢，  
因为我们的血管流淌的是中国伊顿公学的精  
神贵族的血液，  
因为我们的基础是我们的父辈和老师以他们  
的光荣和梦想铸成，

所以，  
1976年10月，当祖国重新踏上人间正道，  
校友中的幸运者必然是国家的首选，  
校友中的坎坷者必然会殊途同归——  
殊途同归在后来居上，发奋求学的道路上；  
殊途同归在脚踏实地，受人尊重的人生中；  
殊途同归在360行，行行出状元的社会上；  
殊途同归在永远的上外附中最优秀的老三届  
校友的  
爱祖国不变质的行列中。



八千里路云和月，  
54年的思和念。  
我们彼此是发小，  
我们彼此是师生，  
我们彼此知根知底，  
我们彼此如数家珍，  
我们彼此惺惺相惜，  
我们彼此相互打听，  
我们彼此心心相印，  
我们彼此默默祝福。

54年后，当我们1000名初中部和小学部的老三届校友全部进入了

2亿多中国老年人的队伍，  
让我们依然对当年的美丽相互赞美，  
让我们依然对当年的聪慧相互欣赏，  
让我们将当年的活力延续到老，  
让我们将当年的记忆永远珍存。

今天的我们，成了地球村的居民，  
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祖国——  
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

我们是祖国的孩子呵，  
尽管我们曾经无人问津，  
尽管我们只能顺其自然，  
我们永远是祖国的最忠诚最孝敬的孩子。

我们是中国人民的儿女呵，  
尽管我们曾经怀才不遇，  
尽管我们已经退出舞台，  
我们永远是中国人民最廉洁最无愧的儿女。

我们是祖国的孩子呵，  
哪怕有的已经持有外国护照，  
哪怕全校师生再也无法全部团聚，  
只要还有活着的师生在，  
只要还有校友的子孙后代在，  
往事将永远不会被封存，  
历史将永远不会被遗忘！  
那就是——  
上外附中永远是共和国精英的摇篮；  
上外附中校友永远是共和国永不腐败的脊梁！

亲爱的祖国，  
我们是您的好孩子。  
我们与您血脉相连，  
我们与您命运与共。  
在您的生生不息的博大的怀抱中，  
我们将安详地有尊严地老去……

在夕阳红的岁月中，  
在同窗之情师生之谊的幸福中，  
在对我们心中的最痛谭文兰老师和Sofka老师的缅怀中，  
在对我们最敬重的已故的母校一流领导、老师和校友中的烈士的追忆中，  
我们只想与母校相伴——  
远远地眺望，  
深深地思念，  
永远地祝愿……

2013年8月26日

（庄依众系上外附中67届英语1班校友）

#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韩信桐

几天前晚上我正在家里吃完晚饭，突然收到一位久别的老友的约稿，说校友创刊号想请我写点东西，说实话我既觉得受宠若惊又有些担心，因为实在恐怕自己不能分享给大家一些太有趣的经历和感受。于是我问自己，作为一个当年成绩并不算优秀的学生，我既不能够跟大家分享附中学习的经验，和申请名校的经历，也不能畅谈说自己高中时候参加过模拟联合国或各种其他活动有过多少辉煌的战绩……这样一个平凡普通的我究竟应该拿些什么来和大家分享呢？想到这里我不禁觉得有一些沮丧，可是静下心来看着电脑屏幕，自己毕业13年来的经历，加上在附中的7年，人生之前20年的许许多多的回忆居然都如走马灯似的纷至沓来……我发现哪怕我只是一个当年上外附中再平凡不过的学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上附中的烙印却越来越深，甚至成为了人生的重要组成。所以我决定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附中平凡人的感受……

我们这届进入上外附中是比较特别的一届，入学那年是正好取消小升初考试的第一年。记得一直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大家还在准备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到了五年级突然取消了，都觉得措手不及。幸好那一年有上外附中作为上海唯一可以通过考试小升初的学校，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使得我们这样的寒门子弟不至于在最后一直接接受命运的审判，随机地进入所在片区的对口中学。我想进入上外附中的那一刻便犹如上帝在我命运的齿轮轻轻拨弄的那一下，从此改变了我之后的整个人生和命运。

我们这届算是历经了附中变迁的一届，我现在仍然能记得我们住过最老的男生寝室。底楼是浴室，宿舍是八个人合用的上下铺。冬天宿舍的窗户漏风让人觉得瑟瑟发抖，厕所一个楼道只有



一个，那时候听完鬼故事晚上都不敢去上厕所。那时候因为冬天实在太冷又没有取暖设备我发明了一个“偏方”，发现冬天用冷水洗脚反而上床之后一开始脚会比较暖，后来想应该是和人脚冻了用雪搓脚产生热量大概是一个道理。后来条件好了我们搬去了新造的寝室大楼，厕所变成了两个寝室共用一个厕所，每天早上被“同一首歌”唤醒，美中不足的可能是我们当时宿舍正对马路，有时候难免觉得吵闹，地板也容易积灰。再后来又搬去了经过改造的小花园旁的宿舍楼，那是记忆中最舒服的宿舍了。听说本来是想作为招待所用的，所以进去的时候每个宿舍都有空调，这样的条件对于那个时候的我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奢侈的享受了……

另外一个食堂的变迁，我们进学校的时候是老的食堂，而毕业的时候食堂已经是在新建

的大楼里面，并且有更多的菜色可供选择，而且颇有意思的是每次吃完饭的时候都会放林志炫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以至于一直到后面很长一段时间，我一听到这首歌就如巴甫洛夫的狗一般仿佛闻到了学校食堂的味道。当然变化远远不止这些，又譬如最早外语活动周最后一天都是在虹口体育馆表演，离校的时候学校已经有了自己可供表演的大礼堂……7年来看着学校的种种变化来不及尽述，现在想来就好像一个孩子看着学校和自己一起成长的感觉，有时候虽然和自己的同学间说起自己学校偶尔也会嘴上嫌弃这个那个不尽如人意，但是每每和外人说起的时候总是掩饰不住的骄傲，一阵吹嘘。

如果说一定要说这七年的上外附中的生活给了我什么，总结下来感觉有两点很重要，第一点是教会我法语一技之长，第二点是教会我做人和生活的态度。入校的时候我记得让我们填写第一志愿是什么，当时小孩子哪里有什么主意，父母后来替我选择了法语。原因其实相当扯淡并且没什么逻辑，一是说以后会英语的多，学会法语一技傍身，二是因为联合国都说法语么。就因为这么奇怪的理由，我就莫名其妙开始了自己二十年的法语人生，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对于我这种不太聪明的孩子来说，学了法语基本上英语就相当于放弃了（当然这不包括班上其他几个语言能力特别出色的同学，真的是学各国语言跟玩儿一样……）。

与那些过目不忘的语言天才同学们不一样，我很早认识到了自己语言天赋方面的不足。所以学习法语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太多的乐趣，也经常在课堂上被老师叫起来批评。但是所幸遇到的老师都很好，有时候虽然怒其不争，但是也从未放弃我……这样一个在上外附中法语一般般的我却最后去了法国读了本科硕士博士，一晃度过了11年。值得一提的是附中初二开始就有来自法国精英大学校毕业的优秀外教给我们小班化教学。这样的教学模式哪怕是毕业以后

从事教育行业的我在其他地方几乎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外语学习条件和环境。因为外教不但教会了我们纯正的口音，强化了发音，同时也在学习中加入了法国文学文化方面的培养。不仅如此，外教时不时向我们介绍灌输各种法国先进教育系统的构成等知识，使得我后来在法国念书的11年中在择校方面从未迷茫，事实上对于法国教育系统的认识甚至比许多法国人还清楚。

因为博士是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我在博士期间自学了英语，尽管如此平时与导师的见面以及邮件往来都是法语交流。导师是法国在计量经济学方面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时常和他的法国同事介绍我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可以和信桐说法语，信桐法语说得可好了。经济学研究的圈子里法国人喜欢建立自己小圈子，并且相互用法语交流几乎是一个人尽皆知的秘密。我在附中打下的法语基础无意中居然在读博的时候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让我和导师之间拉近了不少距离。而且冥冥之中自有天数，我在博士毕业之后万万也没想到居然去了蒙特利尔成为了大学教授。虽然学校是英语教学，但是由于蒙特利尔位于魁北克省，是加拿大最重要的法语区，法语流利这点理所当然也成为了学校当时决定录用我的重要考量之一。佛教中的《杂阿含经》中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我当年在考入上外附中学法语的因，在20年里叶落花开，终于结成了今天的果……

如果说学习法语使得我的生活多了这么许许多多的可能性，那么实际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中学的七年里面，我在上外附中学到了一种生活和做人的态度。这种态度的可贵之处在于教会我学会选择并且尊重自己的人生，让我在面对压力时候不至于彷徨，在迷茫的时候不至于失去方向，在得意的时候懂得谦卑慎行，在孤独的时候学会找到快乐……

这让我想起我之前写过一个答案，问题大概是说“为什么大学老师不去找一个待遇更好的

工作“，我记得答案里大概有这么一句“大学老师大概是这样一份七分悦己三分悦人的工作。许多人被科研的压力弄得整天惶惶不可终日，也有人因为缺钱打着大学老师的名号四处招摇撞骗。那这样便是既不悦己，也不悦人了。学会享受工作，是远比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更艺术的一件事情……”现在想来，我这样的生活态度形成并非一朝一夕，在中学时候老师就鼓励我们做各种想做的事情。你随笔可以写成鲁迅，也可以写成金庸，女生可以写言情，男生也可以写武侠。后来学数学遇到了王春明老师，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高三的时候让我出过一张复习考卷，说你只有把自己当成出题人了，你才能真正懂得出题人的想法和考点。这对当时还在读书的我而言实在是太有意思的事情，哪怕多年后我自己开始带博士生，在指导他们论文的时候我都会说：“首先你们要选择自己熟悉，并且感兴趣的话题，这样你们才不至于觉得博士生活枯燥乏味。其次是要尽量去亲身感受，这样你的文章才会言之有物，而不是纸上谈兵”。

我觉得学校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说你进来上外附中，以后就一定要成为一个外语外交人才。正所谓高术莫用，不是说我们学校是以外语为主，所以在学校里每天所有老师都在告诉你成为外语外交人才。实际上学校传递的精神是：能成为外语外交人才当然很好，但是能成为其他方面优秀的人也很棒，所以你要自己去寻找和探索，世界那么大，瞄准月亮的那个人总是比瞄准树梢的人射得高。事实上我妈希望我做一个医生，舅舅希望我成为律师，父亲当时希望我成为外交官，爷爷一直希望我继承他的衣钵去同济学建筑，叔叔希望我经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怀着善意想要给我的人生不同的建议。可是附中的学习生活使我成了一个自己决定自己人生的人，就好像没有人最初觉得我会成为一个大学老师，而偏偏这才是我觉得最快乐的职业。

我身边许许多多比我优秀许多的人，都是从附中毕业的。他们也都做着自己喜欢做的工作，爱着自己想要全力去爱的人，生活虽然也有压力，但是他们有趣的灵魂让他们从不觉得生活有半点枯燥。感谢上外附中让我们成为了更好的人，也成为了幸福的人，执笔仗剑，周游世界，也会关心身边的人，有趣的事。无论走到哪里，也无论什么年龄，心里面都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韩信桐系上外附中2005届法语2班校友，现任加拿大蒙特利尔康考迪亚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兼任蒙特利尔大学联合数量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上接第11页）记忆之清晰让我们怀疑是我们真的老了还是当年镌刻得太深。有同学自附中一别失联三十年后重新相聚，三十年每个人的人生几乎都是一部书，但重逢的时候我们共同的章节就是附中那六年，那六年的共同也足以淡化之后二十多年的不同。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聚的时候似火的友谊不会被时间冲淡，散了以后各行各业附中校友群星璀璨。2011年做投资后，居然投资圈附中校友可以拉很大一个群。我从三十年前几乎是所有附中同学的小师弟也渐渐变成了每次校友聚会的大师兄了，回母校不变的是新同学们的年纪，变的是他们对我的称呼，哥哥变成了叔叔，而且正在走向伯伯的道路上。

母校每次召唤都是来自心灵的召唤，是再繁忙的工作生活中心灵充电的召唤。尽管30年物是人非，但母校，上外附中，仿佛真的从未离开。

（卫哲系上外附中89届英语班校友，曾任世界500强英国百安居公司中国CEO，阿里巴巴CEO，汇丰银行独立董事，现任嘉御基金创始人董事长。）

# 仿佛未曾离开

卫哲

回眸1989年走出上外附中校门，刚好30年。这所在上海被誉为上海第一“常青藤校藤娃”孵化器的神仙学校和我家源远流长，曾经培养了我们一家四口，我和我姐姐卫红，我的两个儿子。在附中学日语的姐姐在阪神地震中因公殉职也已经离开我们20多年了，她从未见过的我的两个儿子也成为她的校友了。两个儿子常常笑着说爸爸降格为师兄了。

母校每次回去都在变样，当年最新的图书馆大楼目前成了最老的大楼，当年的教室、宿舍、食堂和操场都不见了，母校像变形金刚一样在巴掌大的地盘上上天入地增加面积。不变的是校门口两颗挺拔的雪松和松柏一样常青的那些老师们。记得下雪的时候，雪松成了真正的雪松，如今老师们的华发像极了雪松上的雪。

附中到当时我免试直升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就读也就是隔着一条马路，大学里同样来自附中的同学占了很大比例，附中子弟兵的优越感和打下的外语基础，让大学老师和其他同学都不得不另眼相看。大学匆匆四年丝毫没有离开的感觉，倒是四年里当年的同班同学纷纷远赴海外，难免不少离愁。

工作上的第一个老板证券教父管金生是上外法语系毕业的，不用说，用我做秘书，一定又沾了系出同门的光了。之后在普华永道中国和英国又是师兄师姐姐妹扎堆的地方，即使到了英国也不例外。浓重的英国音难不倒附中人，附中教会我们如何很快也带上英国腔；浓重的英国音也掩盖不了上外附中英语的特色，那种华丽优雅和流畅直逼OXBRIDGE（牛津剑桥音）又有别于OXBRIDGE。在他乡经常会从这种特色上外附中英语中找到校友，大到有一次和杨洁篪部长英语交



流，小到阿里巴巴上市路演中遇到的投资基金经理们，相互听了发音莞尔一笑，续上了上外附中的缘分。

在英国百安居和汇丰银行董事会那些年，让英国人服气的还不止我们的英语，更是我们从小在附中打下的国际化视野和国际化思维方式。从有了儿子的第一天我就毫不犹豫毫无悬念地想把他们送到附中来，他们在附中几年和当年他们父亲一样，饱受挫折，因为学校太严了，同学们太牛了。附中的“挫折教育”在他们到了英国留学后帮助他们报复性地收获了巨大的自信和学业上巨大的领先优势，对海外学习生活的适应能力明显高人一头。

当年分散在海外的同学随着年龄的增大，离愁的加深，反而聚得更多了。每次见面交流最多的还是当年的神人和糗事，（下接第10页）

# 上外附中教会我的三件事

吴海超

上外附中一直有“神仙学校”的美誉，每年全世界名校纷纷抛出橄榄枝，招收附中学子。按我那年2008届来看，此言非虚。当时三百多位同学，最后参加高考的不过三十多人，而大多数都早已找到了人生下一站——大量国内大学的保送名额，再加上附中的外语优势使得学生深得国外高校的青睐，仿佛只要你进的来，一只脚就以跨入名校大门。而名校背后，自然是更好的工作，锦衣玉食，荣华富贵，不在话下。

但是，离开附中10年后，当我再次审视这段岁月，我不禁自问：除了成为名牌大学的跳板，附中还带给了我什么？或者说，当我们把附中的“神奇”单单归结于它“神奇的”升学率的时候，这是否也是一种对于“附中精神”的不解，不公，甚至是不敬？在我另一母校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演讲上，社会学教授Andrew Abbott谈到教育的目的。他说：“教育没有目的，因为它本身就是目的”

（There are no aims of education. The aim is education）。

是的，附中的教育，带给你我的，远不止一张通往名校的通行证。

之前江雪勤学长写下了“耶鲁没有教会我的三件事”，字字珠玑，发人省醒。那当我回望2005-2008在附中的三年，我是否能记起三个附中教会我的道理？（注：作者初中毕业于宁波外国语学校，后考入上外附中全国班6班）

无论是巧合，还是我一厢情愿，下面就是三件附中教会我的事。

首先，我明白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去独立思考，追求正义，并通过自我的努力来推动周围世界的进步。著名思想家杜威（John Dewey）曾说教育是为了明天的社会，那么我很自豪可以在17岁的时候，就在附中见到了理想中



的“未来世界”。无论作为全国班班长参与班内集体生活，或以学生会实践部部长的身分组织校内外各大活动，我和小伙伴们都获得了附中老师们巨大的包容，充分的信任，和平等相待的尊重。无论这事关周五是否可以不穿校服，或教室内可否带手机，我们举行听证会，我们去争论，去思考。我们学会倾听，学会让步，最终在妥协中得以进步。

这种自由平等的气氛当然也经受过考验，但所幸一切得以持续。记忆犹新，某天晚自习，某位校领导路过我们班教室，看到几乎每个书桌上都堆满了书籍，就随口说到“应保持桌面整洁，不能像之前初中一样。”现在想起来，那位老师一定是出于好意，怕桌面书太多，遮挡了上课的视线。但当时我们班同学听了以后，却觉得受到了伤害，甚至是地域性偏见（注：因我们是全国班，所以都来自上海以外的初中。事后想起，年

少的我们，或许过于敏感了）。面对义愤填膺的同学们，我决定代表班级和校方做出沟通。幸运的是，我们的想法得到了包括班主任老师和历史老师的支持。他们都觉得这虽然是一场误会，但既然误会已经产生，那为何不通过沟通来解决呢？

一周以后，我们收到了来自校领导的歉意。回想起来，我是感恩的。那时的我们，是何其幸运。而这种幸运早已化为内生的精神力量，在后面的人生道路中，指引着我朝向光明，坚守善意，温暖前行。

其次，我学到了生活是一趟求知的旅途。这无关目的地，最美的是沿途的风景。就像江学勤学长所言，很多精英学生往往更倾向规避风险，小成即满，且哪怕在毕业后去做自己所爱，但风险较高，利润较小的事业时，也比其他人放弃的快。这不难解释——因为精英学生背负了“精英之名”，所以他们更渴望获得迅速的成功，也更害怕失败，从而让自己“浪得虚名”。幸运的是，附中三年帮我远离了这“精英病”，使我得以听从内心，去尝试心中所想。

简单来说，是附中的人文氛围，从课内历史课上姚老师的循循善诱，到课外模联的唇枪舌剑和“民族魂”的各色比赛，让我从一个百分百的理科生逐渐成为热爱人文精神的社科类学生。这里特别感谢我的班主任和物理老师赵丙申老师。虽然我擅长物理，但当得知我想高三选修历史时，他义无反顾地支持了我的决定。哪怕他不止一次在课堂上讲过，“物理是最适合聪明的孩子学的”，或“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他对于物理发自内心的爱，并未影响他对于我的爱。今天，当自己也已为人师者多年，并即将开启博士阶段的求学，我也更能体会当年老师的心境了吧。恩师在前，高山仰止。

最后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附中三年让我很早明白，幸福的感受并不来自外在的成功或成就，而来自家人与朋友们的关爱。多年之

前，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就在《社会动物》(The Social Animal)一书中阐明了这个道理。是的，如果让我重新再过一次附中三年，我可以花更多时间学习，参加更多学科竞赛，甚至因此可能被当年我的梦想学校耶鲁大学录取。但是，有一点我万分确定，我会因此变得更不幸福，因为我将失去那无数个和高中室友们一起度过的“无聊的周末”或“空虚的夜晚”。

因为是全国班的缘故，我们六个来自全国六个不同的城市，也正是这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漂泊感让我们聚在一起，无话不说，荣辱与共。其中某人获得成绩了（比如写的作文得到了语文老师的表扬），我们静静地听他吹牛，分享他的喜悦；某人要参加演讲比赛，其他人就默默做好PPT，成为那个幕后英雄。甚至是某人失恋了，其他人陪着他哭，陪着他笑。这份源自中的情谊教会了我幸福的真谛，它无关成绩，也无关成就。

当然，除此以外，上外附中还教会了我很多数学公式，英文词汇，或化学分子式。但10年后的今日，令我记忆犹新的确是那些知识以外的感悟和成长。而更重要的是，这是我记忆中10年前的附中，故而不禁追问：今天的附中，是否相比当年，更忠于“教书育人”的教育本质？是否可让学弟学妹们培养出更独立的人格，锻造更高尚的品格？让他们不单单学会如何成功，也学会如何幸福？

看着学校老师们不断奔走，努力革新，我自然信心满满。但也深知，这不单是老师们的责任，更是每一位附中校友的使命。所以，让我们回到附中，参与进来。愿她乘风破浪，直挂云帆。

（吴海超系上外附中2008届全国班校友，2016年获得美国University of Chicago硕士学位，曾短暂供职于UBS（瑞士银行），后创建智梦教育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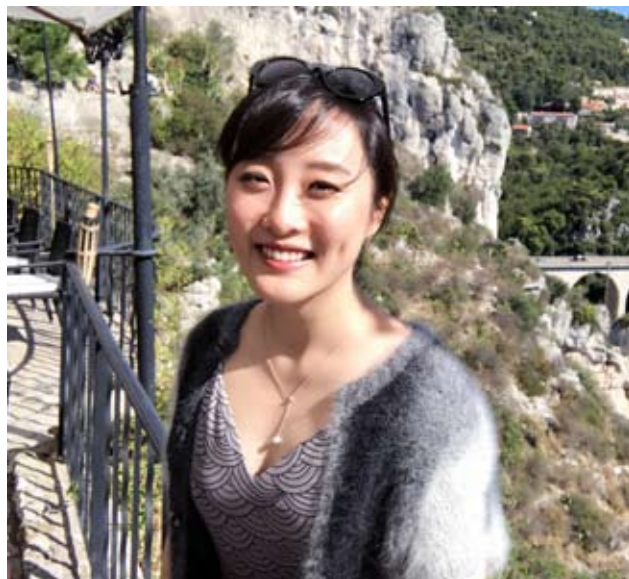
# 我的附中缘

王文嘉

如果说大学赋予我一个自由而无用的灵魂，那附中的七年则让我拥有了一个完整的人格与灵魂。——题记

这篇文章我一直迟迟没有动笔，因为附中于我而言是除了家以外最有归属感的地方，只要想起附中的那七年，回忆如电影一样一幕幕出现在眼前，就好像丝毫没有褪色的胶片交织在一起，让我不知从何开始说起……

我依稀记得上外附中第一次口试结束，在校园里迷失方向的我被面试官领着走到校门口的情景；想起进上外附中第一天，有一个女生扎着粗粗的麻花辫微笑着向我伸出手说“走，我带你去逛逛校园吧！”——后来她成为了一位教育心理学家，而我做了她的伴娘和她儿子的干妈；想起班里大文豪写了一篇关于“好想早恋”的随笔，当我们正在感叹他的大胆时，语文老师给他留下了“16岁还叫早恋吗？”的评语；想起我们用《吉赛尔》和《巴黎圣母院》打破附中历史记录，成为第一个连续两年拿下外语活动周最佳英语剧目第一名的班级；想起学农时候我们看着同学在坡上追球，追着追着自己比球还早一步掉进河里捧腹大笑的场景；想起我们输掉高中最后一场篮球赛——也是高三分班前的最后一次班级荣誉争夺战后，大家强忍眼泪在班级里拍着课桌齐唱“We will we will rock you!”的团结和坚持；想起那个高三每天都会煮咖啡带零食给我们吃，既把我们当自己孩子般照顾又把我们当成年人一样平等交流、把自己最后的生命都燃烧在讲坛上的严老师；想起高三走廊上挂着的大大的“搏”字和每周年级组长吴老师慷慨激昂的演说；想起直升落榜以后坐在教室里哭得不成人形的自己，和鼓励我哪里摔倒就应该在哪里站起来的班主任王老师；想起每周一在广播里喊“请没



有打开广播的班级把广播打开”的教导主任；想起老食堂的清蒸鸡腿、打热水的地方偶尔蹿出的小老鼠、每天吃我们故意掉在地上残羹剩饭的胖麻雀；想起毕业以后每次回母校都会跟我笑着说“你怎么又回来了”的门卫，想起在食堂二楼辣肉面窗口经常偷偷给我们加料的食堂阿姨……虽然我是朋友圈里出了名的只有三秒钟金鱼记忆的人，然而只要是关于附中的一切，我却可以一五一十地说上个三天三夜都不停。

然而谈起我的附中缘，不得不说说那个六年级与我同寝、初二与我同桌、大学与我同宿舍、交换留学碰巧进了同一个项目的奇奇。

六年级的时候我们分到了同一个寝室——416，就在小花园后面，现在改造成了教师办公楼。那是一个不超过20平方的六个人的小寝室，我和她睡在下铺，我的枕头对着她的枕头。1998年的时候，能住进六个人的小寝室实属幸运，当十八个人大寝室的同学们正对我们六人小世界羡慕不已之时，我们416就出现了两个每天走读的叛徒——我和奇奇。



奇奇除了中午休息和为了体验寝室生活而住过的那一个晚上以外——那个晚上因为她半夜打着手电筒在厕所里做功课被我们传为佳话——基本没有在416出现过。对于从小在“老师掌握绝对权威”的教育下长大的我来说，住寝就像一道圣旨，而逃离寝室生活，就等于违背圣旨，这可是一项会被“杀头”的罪名，绝不是“大队长”们能够背负得起的。在强烈的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在某一天中午抓住奇奇，“你为什么可以不用住在学校里？”我问道。“因为我身体不好，我妈妈给我写了纸条，给你看”她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田字格本子撕下来的纸，上面洋洋洒洒的大人字迹一看就是出自“权威人士”之手。“我终于可以逃离这栋把我和爸爸妈妈隔离的监狱啦！！！”我表面假装和平内心却欢呼不已。

说起“这栋把我和爸爸妈妈隔离的监狱”，没错，就是指我们的学生宿舍。其实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那时候的自己为何如此缺乏安全感、如此思念家人，住在学校的每一天都好像再也见不到父母的世界末日一般悲伤，这种情感强烈到影响了整个416寝室的同学们——当然不包括奇奇。每一天，我都要努力地和“我可能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的情绪作斗争，具体表现为除了上课我只干两件事——哭和想办法让爸妈每天来学校见我，于是我的午饭和晚饭基本要依靠416室友们的投食。还记得四位常驻室友为了不让我饿昏在寝室里、电话亭里或者走去电话亭的路上，各自承担了一部分给我打水、带午饭和晚饭的任务，她们努力地不让我一个人呆在寝室里，总会留下谁陪着我聊天，告诉我“不要哭，爸爸妈妈没有抛弃你”，每天如此，一直到我发现奇奇的秘密以后。是的，自从发现每天见爸妈只需要“权威人士”给“权威人士”手写一个证明以后，我就和奇奇一起每天坐873小巴（后来变成了933大巴）上下课，开始了为期10年之久的走读生涯——七年上外附中、三年大学。

如果说附中七年里最后悔的一件事，真的要数放弃住校了。虽然我如愿以偿地每天回到父

母的怀抱，却失去了与一辈子的小伙伴一起晚自习、夜跑操场、夜话八卦的机会，借用一下别人剧本里的台词，曾经有一份温暖的寝室生活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一定会哭着坚持和班级的小伙伴们一起住校，如果非要在这份情感上加上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

我这样说一点都没有夸张，因为进入大学以后，我对附中的那份眷恋和归属感像火山迸发一般全涌出来了。2005年大一的时候，奇奇和我在同一栋宿舍楼，我们常常端着脚盆和板凳一起坐在走廊里泡脚，回想着过去酸甜苦辣的七年青涩时光，为可能再也找不到的那份归属感而落寞。那时候的我们还没有智能手机和微信，只能用MSN与散落在全世界的同学联系，而同学之间最常说的话就是：“如果能让我们回到过去，我们愿意回到附中，重新再走一遍七年。”

我常常与别人说，如果没有进上外附中，我现在一定是另外一个模样。因为这七年是人格、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期，这七年让我知道其实这个世界对人的评价标准不是唯一的，找到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的样子比做一个普世标准下的成功人士更有意义；让我知道每个人都是独立、平等、自由的个体，在没有绝对是非对错的世界里找到万物平衡的规则有多么重要；让我知道有时候付出努力并不能立竿见影看到成果，然而每一次付出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上都会因为点连成线、线连成面而让你事半功倍；让我学会如何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善待他人，学会宽容与原谅。——你看，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题记里说，“如果说大学赋予我一个自由而无用的灵魂，那附中的七年则让我拥有了一个完整的人格与灵魂。”

（王文嘉系上外附中2005届日语班校友，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先后供职于三菱商事、GLOBIS，现在庆应大学媒体设计专业攻读硕士学位。）

# 五十年大团圆

张荣芳



来自全国各地和大洋彼岸的同学们簇拥在黄汉珩、朱慧珠两位老师身边合影留念。

时光荏苒，1969年初离开学校，转眼近五十年。当我们相遇在上外附中时，正值青葱年华，而我们重新再聚时，大多早已年过花甲。当年我们匆匆离开学校时，谁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又一次相聚，要等五十年。

正是凭着对中学生活的美好记忆，对上外附中的一往情深，在众多热心同学的不懈努力下，使我们失去联系的同学，重新聚集在上外附中68届（1）班的旗帜下。

2018年4月7日至9日，68届（1）班的同学进行了毕业五十年的大团聚活动，内容精彩纷呈。

4月7日上午9点，29位同学从全国各地赶来，从大洋彼岸赶来，相聚是我们心中最盛大的

节日。

同学们在母校簇拥在黄汉珩、朱慧珠两位老师身边，合影留念，大家见面的快乐，好像又将我们带回到青少年时代。

我们对校园的土地是那样熟悉，因为我们是从这里出发的，一草一木，倍感亲切，多少同学多少事，幕幕近在眼前。这里有我们青春的回忆，有我们曾经的理想、梦想、幻想，五十年风雨回望，心缘未改。

参观母校之后，大家乘车前往江南古镇朱家角，入住景苑水庄，午餐之后，稍事休息，下午召开联谊会。

为了这次大聚会，班集体共同努力，制作



同学们畅游朱家角古镇，享受悠闲时光。

了《永远的初一（1）班》视频，回顾了中学生活，简要介绍了同学们不一样的人生经历。视频播后，大家反应热烈，纷纷畅谈体会，尔后文艺小节目自娱自乐，气氛活跃。

8日上午，同游朱家角古镇，享受悠闲时光，回归自然，放飞心情。下午我们来到黄浦江畔，同船共游黄浦江。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两岸建筑荟萃了上海城市的精华，也是上海近代城市开发的起点。从游船上观光浦江两岸，为大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华灯初上，最是灯光璀璨时，浦江夜景，缤纷多彩，尽显江岸之美。

4月9日上午，应南方水中心顾总邀请，我们又到青草沙参观。

顾总热情接待，全程讲解，使我们比较深入地了解了青草沙饮水工程创新性技术和文化内涵，站在大堤上，极目远眺，水天一色，风光无限。

青草沙工程是镶嵌在长兴岛西北侧的一颗

明珠，48公里的长堤围起十个西湖大的江面，堤外是滚滚长江，堤内江水幽蓝，清波荡漾。工程更重要的意义是，源源不断地向上海提供优质水源。

午餐后我们来到中国3D打印文化博物馆参观，该馆收藏了3D打印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成果，涵盖了医疗、航天、汽车制造、文化创意等众多领域，使我们大开眼界。

才相见又再见，聚会转瞬已成为历史的一页，我们还会再聚，我们会记住难忘的师生之情、同学之情，记住永远的初一（1）班。

风风雨雨五十年，缅怀母校万千言。妙言不减当年趣，调侃犹存儿时憨。纷争世界寻静土，恬淡心田忆涛澜，莫道人生霜已染，真情自是天地间。

（张荣芳系上外附中68届英语1班的校友，u曾就职于中国中铁建工集团。）

# 共同构筑二十一世纪的中美关系

——记克林顿总统与上海各界人士的座谈

朱榄叶



1998年6月30日上午，连续阴雨了多日的上海天空终于露出了笑脸，上海图书馆前雨水冲刷过的树木显得更加郁郁葱葱。

8点50分，我们来到图书馆的老唱片陈列室，等待着克林顿总统夫妇的到来。和我一起等待的有复旦大学前校长谢希德教授、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金鲁贤、同济大学校长吴启迪、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左学金博士、复旦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吴心伯博士、著名作家王小鹰女士、东方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曹可凡先生、著名电影导演田壮壮先生和全国著名的打假英雄王海先生，我们一面等一面交流各自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9点20分左右，克林顿总统夫妇在徐匡迪市长的陪同下来到我们中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向总统一一介绍参加讨论会的嘉宾，克林顿总统

和每一个人亲切握手。当克林顿总统走到我面前时，我对他说：我是华东政法学院的教师，同时也是律师，我们是同行呢，总统听着笑了。

在徐市长陪同总统参观上海图书馆时，我们来到图书馆目录大厅的讨论会现场：只见几张中式的大桌子围成个“半圆形”，每个参加讨论的人都被指定了位子。我坐在金主教的旁边，我的左面是复旦大学的吴心伯教授。我坐在位子上注意看了一下，组织者经心安排的座位正好是一位先生一位女士隔开坐，克林顿总统夫妇坐在中间，他们的两边分别是谢希德教授和金主教，十名讨论者五男五女，也显示出了男女平等。

不一会，总统结束了参观，从图书馆的旋转楼梯上走下来。我们全体起立，鼓掌欢迎。总统夫妇就座后，克林顿发表了简短的开场白，接

着他就问我：朱榄叶教授，你是法学院教学的，你能不能从你的角度谈一谈中国法律制度发生了哪些变化？事先白宫先遣队的官员就告诉我们，克林顿总统很善于组织类似的讨论，并说他也许会问哪些问题，可我还是没想到第一个问题是问我的。要说中国法律制度这20年来发生的变化，至少可以讲上几个钟头，可这是一个讨论会，每个人都要有个发言的机会，我只能在尽量短的时间里用最形象的例子来说明问题。我说，16年前我到华东政法学院工作时，我校学生仅1000人，当时上海只有3所法学院系，而现在我们有了近4000名在校学生，上海有近20所法律院系，接着说到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数量大增，表明公民通过法律保护自己权利的意识增强，同时也需要有更多的律师，法律院系也应运而生，数字的变化反映出中国法律体系的发展。克林顿总统接着问了在座的其它人不同的问题，交谈的话题非常广泛，从教育的普及谈到英特网的运用，从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到科技的应用。交谈中，我们也向总统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我第一个回答问题没有想到利用自己的“特权”问总统一个问题，看到其他发言者都不失时机地问了他们想问的问题，我也举手示意有问题要问。总统很善解人意地给了我一个机会。我问他：美国历史上大多数总统在任时都是六、七十岁，离任后大多数不再工作，而您是美国历史上较年轻的总统，您卸任以后还很年轻，肯定会继续工作。我知道您以前当过律师，也作过法学院教授，您今后准备是当律师还是当教授？如果当律师，是在华盛顿工作还是会到家乡阿肯色去？没想到我的问题让他犯了难。他说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三年轻的总统，至于2000年他卸任之后干什么，还没有考虑过。但阿肯色有他的家，他会在那里建一座图书馆。克林顿总统半开玩笑地问“我能到你们学校作访问教授吗？”我几乎没有考虑就脱口而出：“You are more than welcome.”他说他可以考虑。这个时候，同声翻译却把我用英文说的话翻译成了“可是你不会说中文”。（同声翻译有的时候是预先估计别人会说什么，就直接“翻译”出来，他没有想到我会用英文说。）实际我是在总统开玩笑说用美国律师换中国的技术人员时说But they（指美国律师）don't speak Chinese.

时间过的真快，9点40分左右开始的讨论，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讨论的气氛越来越活跃，从一问一答变成了互相插话、补充。快到11点了，我身后白宫先遣组的组长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Please end this meeting by saying: Mr. President, we know you have a very busy schedule. W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listening.”我知道他们想要我提醒总统：时间到了。等到正在发言的人讲完了，我举起了手，谁知此时克林顿总统也正要允许另一个人发言。他看到我举了手，就说：朱教授，你先讲吧。我心想：我怎么能先讲呢，我一讲您就不能再讲下去了呀。我说：总统，请您先讲。他坚持让我先讲，我又推辞了一次，但还是没拗得过他，我只好稍加发挥地表达了白宫官员的意思，我说：我们非常希望能继续讨论下去。但我们知道总统先生日程安排很紧，很高兴今天能和总统一起讨论。总统听了这话，并不急于结束讨论，他还是让已经举起手的王小鹰女士和王海先生各问了一个问题，总统夫人和总统分别作了回答。然后他才总结性地对讨论作了概括，最后他让我们每人简短地就中美关系的发展谈谈自己的看法。我说，中美两国人民应当增进相互了解。我去过美国多次，在同一层次的人中，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大大超过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两国人民应当加强彼此的了解，特别是美国人民应当更多地了解中国，这样才能知道我们真的需要什么，才能提供一些切实的帮助。

11点15分，讨论结束了。总统一行匆匆赶往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参加《市民与社会》节目的直播。

能直接和美国总统对话，这样的机会实在是非常难得的。在中美两国领导人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两国高层领导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如此坦率地通过电视直播的方式告诉全国人民，我想，这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克林顿总统此次访华，必定会加深两国之间的了解。如果我们每个参与者能起到哪怕是一点点作用，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朱榄叶系上外附中66届英语1班的校友，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上海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成员。）

# 集世界智慧 促上海发展

张伊兴

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咨询会议（IBLAC）是一个由上海首创，并且坚持了近三十年的国际会议。从诞生之初至今，得到了历任上海市领导的重视和关心，通过这个会议，他们借助“外脑”和“洋高参”，围绕不同阶段上海这座城市发展的重点、难点、突破点展开研讨，推动上海的改革、开放、创新和发展，思想在这里交锋，智慧在这里迸发。

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上海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双重挑战，面临着体制改革带来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轨制的困扰。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同志，决意运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智慧和先进技术推动上海的发展，他接受了经叔平先生关于邀请国际著名企业家担任上海市市长咨询顾问的建议，并报国务院获得批准。

经过上海市政府的多方努力，于1989年10月9日，有8个国家的12名成员如约来到上海，在上海西郊宾馆举行了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首次会议。他们是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格林伯格、加拿大施兰酿酒公司总裁布朗富曼、意大利菲亚特公司执行副总裁盖洛博士和美国康地谷物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史德理，以及其余8名成员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朱镕基市长致辞道：“作为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成员，你们的行动不仅反映了你们对中国和上海人民的友谊，也显示了你们的远见卓识。你们预见到，上海的开放和发展对未来亚太及世界经济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上海人民会永远记住你们。”

这次会议通过了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章程，推举格林伯格先生为第一任主席，

决定以后每年10月都在上海召开一次研讨会。

三十年来，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理念和运作方式日趋成熟。目前，会议成员已增加到16个国家的50名成员（含9任前主席），会议成员的地域和行业分布也更趋多元化。成员中除了来自美、英、法、德、日等经济发达国家，还有瑞典、澳大利亚以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南美洲智利、巴西，亚洲印度等地的500强企业。新加入的成员，年富力强；行业涉及信息技术、矿业、制药、化工、节能环保等领域。他们无不是世界相关行业的领头羊和佼佼者。2011年第23次会议还确定了会标，通过了“汇聚智慧的火花”的设计方案。同年10月28日建立了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官方网站。

纵观近三十年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议题，可以清晰地看到，会议每年的议题都是紧扣上海当年的发展要点；看到上海的变化，感受到城市发展的脉搏，以及未来上海建设的战略思考。

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面临国企改革、市场培育、经济转型、城市变迁等问题，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就上海要成为国际大都市的硬件建设，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到了2000年，进入新世纪后，应对中国入世的新形势，上海开始着眼于软件建设与管理，把目标锁定在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议题也随之聚焦到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当好科学发展先行者上。

1900年，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主题是“开放浦东新区，扩大对外开放”。成员们认为，要加快浦东的开发和加速产业结构调整，需要金融业的有力支撑，建议上海要进一步有计划地开放金融业，并就此问题组织一次国际



上海2006年IBLA会议，张伊兴（左）在机场迎接以色列副总理兼工贸部长埃胡德·奥尔默特

研讨会。上海市政府采纳了该建议，于是年10月15日，召开了上海金融国际研讨会。

1993年，浦东在全国率先尝试“土地实转资金空转”的开发模式，以激活沉睡的土地。如今的陆家嘴金融城已有88幢亿元楼，而在开发之初，这里鲜有人问津。为表示力挺，会议成员纷纷将自己公司的代表处、或地区总部入驻浦东。在那次会议的晚宴上，我们看到黄浦江对岸的浦东还是一片漆黑，成员们纷纷建议：“我们要让浦东亮起来！”

2000年，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议题是“提升管理水平，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当时，市政府对有些外资企业投诉“上海通关环

境不好，通关速度太慢”非常重视。将一份由市外经贸委和普华永道联合署名的《上海提高通关效率调研报告》在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上征询意见，引起了与会成员的广泛关注。根据大家提出的建议，先后派出专员去香港和新加坡学习先进经验，开展一系列快速通关试点。实践两年后，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在上海召开“大通关全国现场会”，各省市纷纷派员到上海学习快速通关经验，使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管理水平得到提升。

2002年召开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探讨了如何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申办2010年世博会的支持问题。在主席的带领下，全体成

员联名致信国际展览局，表示支持中国申博的意愿，信中写道——“完全相信中国有热忱、有能力、有实力举办一届精彩的世博会，并承诺全力支持上海申博和办博。”

2003年，第15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召开之际，上海已经成功获得2010年世博会举办权。这一年的主题就关于如何举办一次最精彩、成功、难忘的世博会展开了充分的讨论。会议还特邀了国展局秘书长、德国汉诺威世博会负责人和葡萄牙里斯本世博会负责人与会介绍情况。许多会议成员就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演绎、招展和游客吸引、投融资计划、场馆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可操作的建议。有些成员单位还积极参与他们本国国家馆的建设，出资、出力、出创意。为了感谢各位成员的支持，上海市政府邀请了会议的历届主席出席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开幕式，当年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开会的前一天，时任市长韩正亲自陪同与会成员参观了中国国家馆。

2008年10月，源于美国次贷危机持续加剧，国际金融危机从局部扩展到全球，从金融领域扩散到经济领域。然而，在这样特殊的时期，会议沈德培先生及其他31位成员依然如期抵达上海，参加第20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视平常之举的背后，彰显的是与会成员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承诺。

在这次会议上，应邀与会的演讲嘉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联合国秘书长特别经济顾问杰弗里·萨克斯说：“这次经济下滑，对中国是一个机会”“借着这次机会，上海应该更好地建设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比如说便捷的交通、安全的水供应、洁净的能源等”。有不少成员与他持相同观点，认为经济动荡也是个潜在的机会，政府对铁路和电信等基础设施的投入，

会使上海在金融危机之后，为下一轮竞争积攒实力。

2013年，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议题是“提升城市软实力”。会上，瑞士罗氏集团董事长和美国贝恩董事会主席、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都指出，在全球竞争的进程中，上海要更加重视人才问题，要让上海的人才走出去、愿意回、留得下。上海市政府结合上海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了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后备人才，海外实训计划——市委组织部选拔一批40岁以下，副局级或者正处级领导，通过语言考试，到海外参加一年实职培训，找带教老师、参加当地高层会议。现已有不少人才被派往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成员单位总部工作。

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创立至今，会议的主人始终是上海市市长，会期也总是固定在每年的10月底。这样的安排，可以让每次会议的讨论结果，成为上海市政府商讨来年工作时的决策参考。

会议除了专题讨论外，还有许多精彩纷呈的会前活动。1997年和2005年，市长曾先后安排与会成员参观了浦东金融街和洋山深水港等城市在建项目，了解上海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阶段性成果，以吸引更多企业共同参与上海的建设。

1998年和2014年，市长组织与会成员参观了当时新落成的上海大剧院和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欣赏了由上海本土乐团演出的音乐会，展示了城市软实力建设和海派文化传承，得到成员的认可和赞赏，促进了跨国企业与地方文化交流和艺术人才培养方面的进一步合作。

2007年至2009年连续三年，市长邀请与会成员参加了主题纪念林植树、中华鲟放流和鸟类环志等以生态环境为主题的系列活动，体现上海对生态和发展生态平衡的关注，以实践的方式，演





上海2006年IBLA会议期间，张伊兴（女）与会议成员合影

IBLAC 2006 Shan

绎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发展理念，使成员对上海城市在生态环保方面所作的努力有了新的认识。

2013年和2015年，市长陪同与会成员实地考察了具有代表性的创业基地、大学校园、研发中心，与本地高校学生、企业家、创业人员和科研人员面对面交流、对话，使成员对上海最前沿的发展状态有了直观的认识、感受和理解。

一个个议题、一次次智慧碰撞，世界触摸到的是一个发展速度与思想理念不断提升的上海。这些来自世界的智慧火花，陆续演化为可行的具体措施，点点滴滴推动着上海，不断实现新的跨越。每年的议题，看似不同，各有侧重，组合起来，便可以看到上海的发展走向。

正如时任上海市市长韩正，在会见专程来沪

出席第24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第二次预备会议的会议主席、贝恩公司董事会主席奥里特·加迪耶什女士和副主席、卢克希奇集团董事长卢克希奇先生时指出的，“每一个上海市民都知道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及其对上海所作的贡献，上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变化和发展，都凝聚了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智慧。”此会议开创了用国际视野、世界智慧来谋划中国城市未来和发展的先例。

（张伊兴系上海外国语学校63级小三英语1班的校友。历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外办副主任、上海市港澳办副主任。2004年至2014年担任上海市市长咨询会议秘书长。）

# 上外附中成全了我的外交梦

陈山民

我是上外附中1963年入校的首届初中生，在校5年（文革2年），1968年赴黑龙江建设兵团4年。1972年，经附中老师推荐、外交部考核，与我校老三届初二、初三年级16位同学被招录进入外交部，其中包括杨洁篪、王光亚等同学。

此后，我们经历了近40年丰富多彩的外交生涯，走过了一段难忘而有意义的人生旅程。就我而言，先在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学学习，从1976年开始，先后在中国驻芬兰、坦桑尼亚、爱沙尼亚、巴基斯坦使领馆任职，在外交部非洲司、西欧司、港澳办、政策规划司、对外友协等不同部门工作。1996年开始，有幸参与香港回归祖国的有关工作，并于1997年7月1日后被派往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3年。2010年，我完成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的使命，结束了近40年的外交生涯。

从事外交多年，我深感这是一个与祖国尊严和人民利益密切相关、受人尊重的职业。作为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代表，在对外交往中，你时时处处直接分享着祖国的荣誉，感受着世界人民对中国的尊敬。

我到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卡拉奇总领事伊始，巴政府和人民给予我热情款待，政府高官优先安排与我会见，亲切交谈。巴社会各界和友好团体举办形式多样的欢迎活动，夹道欢迎，抛洒花瓣，载歌载舞，欢迎活动持续数月，令人十分感动。为了确保中国外交官的安全，巴政府派军警24小时守卫在我总领馆门外。我只要外出执行公务，总是警车保驾，军警随行。在外交场合，巴各界朋友、外交界同事主动与我交谈，了解中国。行走在人群中，当地普通百姓在得知我是中

国外交官后都会主动向你竖起大拇指，并握手致意。我明白，巴人民是在通过我来传递他们对中国的喜爱和感激之情。不少外国同行们不无羡慕地说，中国外交官在巴是最受欢迎的。

外交工作给予你经历和见证历史的机会，为你提供了展示中国、探究世界的广阔平台。在巴基斯坦，我经历了贝·布托遇害、穆沙拉夫总统下台等历史事件，参加了中国援建巴瓜达尔港的竣工典礼，接待多起国内访巴代表团组。为迎接香港回归，1996年，我有幸作为外交部派驻中央香港回归活动筹备小组工作人员，参与了香港回归祖国系列活动的内部方案设计、协调及组织落实工作，参加了交接仪式等活动场地的考察及有关活动的具体安排。1997年6月30日，我随中央香港回归筹备活动工作小组提前进驻香港，经历了各项回归庆典平稳有序的展开。在中英交接仪式现场，我目睹了当《歌唱祖国》歌声响起，五星红旗在香港会展中心冉冉升起的那一刻，中国代表团、观礼团、香港同胞、海外侨胞热泪盈眶、同声齐唱的感人场景。我见证了中华民族洗刷百年耻辱的重要历史时刻。7月1日后，我又开始在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全新的工作，在自己的国土上从事外事工作，亲历回归初期“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如何从政策到实践的探索和落实。

回顾我的外交生涯和成长进步，我非常感谢母校——上外附中对我的教育与培养。

从建校伊始，附中就十分重视对学生德智体全面培养，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教导我们心怀祖国，放眼世界。学校大力开展学雷锋活



上外附中首届运动会获奖同学合影

动，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引导学生树立为国学习和奉献的正确人生观。这些都为我日后参与外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外交官，首先要忠于祖国，信仰坚定，严守外事纪律。我在驻外工作期间，也曾碰到过政治上的考验和物质利诱，但我都能守住爱国的底线。外交官不仅有觥筹交错、光鲜亮丽的一面，更要时刻准备面对战乱、疾病、艰苦环境、突发事件等等特殊困难和危险。在非洲坦桑尼亚，要经受酷热和疟疾的侵扰。在巴基斯坦要面对恐怖袭击的危险。如果没有对祖国的忠诚，计较个人得失，就无法坚持，难以完成国家所赋予的使命。

附中在重视智育方面历来享有良好的声誉。外语教学独具特色，听说领先、情景教学成为样板。正是由于在附中三年打下的扎实外语基础，使我和一批老三届同学有可能在国家急需外语人才之际，加入我国外交队伍，成就了我们的精彩的外交人生。

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除外语外，还需要广博的知识，因为你所打交道的人社会背景各异，交谈的话题触及方方面面，政治、经济、军事、法律、艺术等等，无不涵盖。附中学习的中



赴港区码头劳动

文、历史、地理、政治、数理化等各科知识都能用上。感谢学校汇集了一批优秀的各科老师，给我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附中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体育比赛、文艺会演、社团活动扩展了同学们的才能。我爱好体育，参加的校篮球队在虹口区比赛中取得好名次。在学校首届运动会上，我获得60米短跑冠军。健康的体魄和团队精神为后来的对外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学校组织社会实践，到港区码头和郊区农村劳动，参观军舰，接触社会，增加了我们对国情的了解。为我更生动地向各国朋友介绍中国，讲好中国故事，积累了素材。

上外附中成全了我的外交梦，作为老校友，我愿为母校的发展尽一份力。我也愿通过校友刊物这个平台，与大家交流心得，增进友谊。

最后，衷心祝愿上外附中越办越好，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特别是外交人才。

（陈山民系66届英语1班的校友，曾在外交部非洲司、西欧司、港澳办、政策司及对外友协等部门工作，历任驻芬兰使馆二秘，驻坦桑尼亚、爱沙尼亚使馆政务参赞，中国驻巴基斯坦卡拉奇总领事）

# 有努力就会有机遇 有机遇就要有奋斗

吴凤祥



我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现在是一个拥有三个多亿总资产的上海长宏实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公司董事长。当我忆起一九六五年那个难忘的盛夏，我们怀着初识的喜悦与惊奇，相聚在上外附中初一（4）班这个平凡的集体里，从此开始了三年同窗生活，度过了人生那段最纯洁而最浪漫的时光。三年的上外附中学习生活，我们在学校老师的培育下，不仅收获了学业，更收获了人生的精神和力量，同学间、师生间获得了真挚、纯洁的友谊。时光神速，一九六九年又迎来了一个难忘的夏季，我们告别了熟悉的母校，也告别了亲切的你和他，踏上了社会，开始了新的人生道路。我们中有的插队落户，有的继续升学、深造；有的进了工矿企业，有的去了部队大学校；还有的回乡务农……各有千秋，各奔前程。我就是回到家乡务农，开始了我新的农村生活。

岁月如梭，时光流逝，转眼间我们已走过了五十多个春夏秋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人生足迹。一万八千个日日夜夜里，我常常思念着我们同学间的友谊。每每回忆起我们上海农村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心中感慨万分，我在农村工作生活五十年，我悟出了一条真理：在人生的道路上有

努力就会有机遇，有机遇就要有奋斗。

我的家乡是在上海宝山淞南镇，地处上海近郊，是一个以城乡结合部向城市中心城区逐步演化的区域，也属上海中心城区向外辐射扩散的第一辐射区之一。我在家乡劳动、工作、生活几十年，在生产队务过农，在镇农业公司当过经理。一九九二年正值农村大开发时期，我受镇党委、政府的重托，回到我们村担任党支部书记。我亲眼目睹，见证了党在农村改革开放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是改革的强劲东风，吹醒了那块沉睡的土地；我亲身经历了农村改革开放的进程，饱尝到了农村改革开放带来的甜头。

最近习总书记向全党发出了号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这使我深深的感到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一个基层党支部书记，一定要通过努力奋斗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振兴公司，让职工更幸福作为我们的首要任务和中心工作。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成功始于脚下，我和我班子全体成员一起站在这农村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认清形势，努力奋斗，紧紧抓住三个机遇，实现三个转变，做到三个突破，使我们村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征途上不懈努力，健康成长。

一是抓住农村改革开放浪潮的机遇，结合我们城郊结合部的特点，在农田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大力发展村队办企业，全村拥有大小十几家村队办企业，使农民家庭纯务农格局逐步向务工方向转变，使我们村级经济更有活力，经济总量从近百万元向千万元突破。

二是抓住农村城市化建设的机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刚回到村里，正面临着土地大开发的势头，我就按照“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原则，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领支部一班人，抓发展，抓开发，配合市中心城区（杨浦、虹口）等



地区的城区改造，结合我们自己农村旧村宅改造，两者结合，实施了房地产业的全面开发，这样做既加快了城市化道路的进程，又使我们村级经济结构实现了根本性转变。由于房地产业的开发，淞南地区全面实现了无农田、无农业、无农户的“三无”地区，从而加快推进了地区城市化建设的步伐，也带动了全村其他各产业的良性循环和稳步发展，使村级经济结构变成了由房地产业、集装箱物流业、物业管理、商贸业等多产业的综合性经济格局。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经济总量突破两个亿，也为今后撤村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和前提条件，在走农村城市化道路上有了新的突破。

三是抓住撤村改制的机遇，我们在撤去村级体制机制的同时，进行资产全面评估等各种法律手段，通过银行贷款，职工参股，共同购置等形式，将原来村级集体资产转化为股民自己的资产，使村民变成了股民。顺利地完成了撤村改制工作，成立了新型的上海长宏实业有限公司，变更了工商登记，使原来的村级集体经济体制全部向非公经济转变，这是在经营模式和体制形式上

取得改革的根本性突破，这也是在上海郊区纯属罕见。

改制结束后，我就带领全体班子成员和公司董事会成员一起撸起袖子拼命干，想方设法，筹集资金，投资了一亿多资金，建设了居全市第二规模的世纪联华大型超市，成为了该地区的主要购物中心。将原来以集装箱物流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转化为以商贸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使公司总资产突破三个多亿，经济综合实力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经营模式有了新的活力。

回忆往事，激情奔放。心中思念着人世间最伟大最纯洁的情意，即是我们的同学友情，同学情意最珍贵。我们的同学情难舍难分，像风筝舞天，似藕断丝连，让理想放飞，让真情挂牵，人生岂能如人意？每当我们同学聚会时，就是我们人生的盛宴，重叙那牵肠挂肚的乡愁，重温那心中未泯的回忆……让我们之间的同学情，更加清纯，更加永恒，这怎不感天动地！

（吴凤祥系上外附中68届德语班校友，现任上海长宏实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 从军之路

倪志远



今天是三月二十日，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庄严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习近平主席铿锵有力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回荡，作为一名从上外附中这个外交人员摇篮走出去的解放军老战士，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说来也巧，五十年前的今天，上外附中二十八名青年学生投笔从戎，穿上军衣，背起背包，随虹口区数百名应征入伍的新兵一起，满怀激情地从虹口体育场出发了。

经过五天五夜铁路“行军”，到达了西南地区空军雷达兵某团。该部队肩负着对祖国西部空

域的警戒任务，大多数连队驻守在川西北高原，那里海拔四千多米，高寒缺氧，环境十分恶劣。记得当时有四句话作了形象的描绘：“山高只长草，风吹石头跑，一步三喘气，四季穿棉袄”。

一九七〇年，我和同班同学马中华所在的六连由绵阳调防至川北高原阿坝。阿坝州“海子山”雷达站海拔近四千米，地处红军长征走过的雪山草地，北边就是著名的若尔盖沼泽地。连续几天的车马颠簸，顿顿啃着饼干和大蒜，加上海拔逐渐升高，脉搏跳到了一百以上，确实有点支撑不住，为此后来还得了“恐蒜病”，好几年一见大蒜就想吐。

到雷达新阵地后，让我们意想不到的的是六

月份居然下起了鹅毛大雪，几尺厚的大雪覆盖了散放在草地上的兵器设备，因为新建连队，只能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棚中过夜，棚中四处透风，早晨醒来，被子上尽是外面飘洒进来的雪花。初到高原大多数战士头晕乏力，吃不下饭，晚上无法入睡，“高原反应”十分强烈，有的战士还出鼻血，大家照样争先恐后地架设机器，修建“营房”，各个班的小广播十分活跃，表扬好人好事，互相表示决心。条件虽然艰苦，但同志们精神饱满，心里充满激情和力量，因为都明白“当兵光荣、责任重大”，知道自己是来保家卫国、参加“革命”的，有的生病发烧，吃点药继续战斗。我们上海兵，一点不输给以吃苦耐劳著称的湖南兵、四川兵。看看现在十七、八岁的年轻人都还处在家庭的百般呵护之中，我们这一代，无论是当兵还是下乡，真的非常不易，哪来的那么一股子劲，那么一种精神，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在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

雷达部队高度分散，不是在海岛就是在高山，远离后方基地，供给困难，生活工作条件艰苦。连队没有正规住宿条件，立起钢架围上草皮土块，就是“营房”。长年吃不到新鲜蔬菜，后勤部门一、二个月才派车送一趟主、副食品，蔬菜拉到山上，早已冻成了冰疙瘩。高原上一年只刮一次风，从春季一直刮到冬季，寒冬气温降低至零下二十多度。连队没有澡堂，吃饭没有桌椅。对生长在南方大城市的学生兵，这是必须要过的生活关。文化生活更加无从谈起，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政治机关一年上山放一次电影，战士们戏称“电影周”，老片子看了又看。平时除了值班就是训练，有时偶尔阵地边公路上开过一辆汽车，大家都会好奇地看上一阵。尽管生活如此的枯燥，工作是那样紧张，但是大家内心很

充实，除了有时会想想家，心思都扑在战备值班和训练上，这就是信念的力量。

我曾在荒漠无际的草原上遇到一位年轻的兽医，来自上海某一卫生学校，听说是老乡，感到非常亲切，他热情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盐津枣”招待我们。这一幕让我从内心肃然起敬。年龄和我们相仿，单枪匹马只身在大草原日夜奔波，无私地为藏族牧民辛勤付出，我们这些困难又算的了什么。

此时，又禁不住让我想起上外附中李笑牛、林晓薇等十一位在黄山茶林场为抢救国家财产光荣献身的烈士们，十八岁的花季走了。她们才是激情燃烧岁月涌现出来真正的热血青年，我们这一代的英雄楷模、杰出代表，我们永远永远深深地怀念她们……

一晃，人生已近七十，三十年部队生涯终生难忘。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国防事业，青春无悔，人生值得。能为国家、民族、人民出一份力是自己的骄傲。部队艰苦生活的磨练弥足珍贵，使我懂得了怎么做人，怎么走好人生之路。每当看到歼20、运20、轰20、C919、量子卫星陆续飞上蓝天，航空母舰、万吨大驱、核潜艇一艘艘驶向深蓝，内心激动不已，忍不住热泪盈眶。作为上外附中首届毕业生，虽然无缘外交工作，但仍可以自豪地说一声，没有辜负母校的培养和希望，在文武不同的岗位上，同样为国家用了“心”，出了力，尽了职，做了自己该做的事。

感恩母校的栽培！

写于三月二十日夜

（倪志远系上外附中66届法语班校友，空军大校，曾任空军政治学院信息管理系政委。）

## 培养造就新一代公关人才

张黎明

作为曾经的上外附中学生，我为母校在多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声誉感到自豪。50多年来，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无论从知识传授、性格塑造和人文熏陶等方面，都给予了我们巨大的财富，成为我们人生中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我是67届初中毕业生，离校后在多个领域工作过，参与和见证了半个世纪祖国的巨大变迁。退休后，应邀参加了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做一些社会公益服务工作。这里，我介绍一些协会在公共关系人才培养方面的工作和大家分享。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关系起源于美国，是改革开放以后才被逐步引入国内的。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是中国率先成立的第一家公关协会，协会作为全球公关联盟成员，与美国、英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公共关系协会和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协会通过开展公关服务和海内外交流合作，为会员单位搭建了一个相互交流或与政府有关部门及媒体沟通的平台。此外，协会还定期开展公共关系发展战略研究，制定公共关系的职业道德准则和有关管理实施办法，推进相关政策和法规的贯彻执行，并且通过举办各类型的讲座、研讨会、论坛等方式增强会员之间的联系，培训高层次公关人才。公关协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紧贴时代脉搏，围绕上海及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积极开展公关沙龙、高端讲座、高峰论坛等多种形式的公共关系活动，邀请海内外知名人士共同探讨社会热门话题，取得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好评。协会通过定期举办公共关系学奖金评比和优秀公关案例评选等活动，推动社会各行各业增强公共关系意识，现已成为协会的品牌活动。通过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较



好地促进了各类企事业单位与政府部门、新闻媒体机构的相互沟通交流。

公共关系事业的快速发展，需要一大批人品好、水平高的公共关系专业人才。目前，上海已经有五所高校设立了公共关系学本科专业，占我国内地设有公共关系专业的高校数量的三分之一左右，超过了北京和广州。这与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相匹配的。向上延伸，有三所高校设立了公共关系学硕士点，在博士点中也设立了公共关系方向；向下延伸，些学校在设置公共关系学专科专业，加上自学考试中已有的公共关系学专业，从学历教育来说，已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培养机制。这样一种规模，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任何一个省市自治区都无法比拟。

近两年，上海各等级学历教育的公共关系学专业毕业生每年已近300人左右，其中许多人进



入了专业公共关系公司，或在企业、学校、政府部门从事公共关系方面的工作。当然，作为学历教育的补充，对不是科班出身的公共关系从业人员，也有一个在职培训的问题。协会为此曾举办多期国际商业传播师专业资格培训和公共关系高级经理人员培训班，培训出了一批高层次的专业人才。而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推选的公关员职业资格鉴定的培训和考试，也吸引了一大批有志于公共关系事业的青年参加。据统计，通过考试获得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证书的现已超过10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投身于公共关系行业。

自2013年起，协会为培养中国公共关系事业发展的优秀后备人才，鼓励海内外优秀学生报考本市高校公共关系学专业，激励本市公共关系学专业学生勤奋学习公共关系理论知识，积极参加公共关系实践和学科竞赛活动，根据国家和上海市政府有关奖学金设立与实施的文件精神，会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研究决定，共同发起设立“上海市高校公共关系专业专项奖学金”的评比和颁奖活动。这一活动，也是协会的一大创新举措，每年奖励度为人民币30多万元，力度之大，在全国范围内是前所未有的。在具体动作上，协会更是从进一步扩大活动的社会影响考虑，在每年的评比中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创新和提升。2015年，为使这项工作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专门成立奖学金评定工作联席会议（非常设机构），由公关协会、市教委、团市委和各相关高校领导组成，负责本奖学金评定工作，制定当年实施方案和工作督导。对于奖项和奖金的设置不断改进，从综合奖、实践奖和新生奖改为优秀学生奖和特等奖，奖金额度也拉开了优秀学生奖（3000元）与特等奖（10000元）的

差距，使获奖学生的覆盖面更广，不仅突出了特优学生，同时对参与的学生获得感也更强。特等奖的产生，采用现场PK、书面策划、主题演讲等形式。为了提高学生思辩和表达能力，培养团队精神，不断提升奖学金评选新内涵，重视创新实践，组织了高校团体辩论赛。通过这样的一些评比有利于了解参赛学生对知识技能的运用和把握。每次的颁奖大会，市人大、市政府、市委统战部 and 市教委、团市委等有关领导都会出席。同时，通过各类媒体的大篇幅报道，网络现场直播，电视台剪辑播出，增加了活动的社会覆盖面和公众影响力。近几年来，许多优秀公关专业学生在就读和实习期间已经被沪上不少知名公关公司和企业公关部门关注并跟踪培养；一些获得公关专项奖学金的优秀学生正在本市重大活动中发挥着骨干作用。他们专业强，上手快，有不少人已经晋升为总监、高级经理或经理。他们是上海公共关系事业的一支生力军。在项目策划、新媒体运用、与公众的沟通等方面都施展出才华，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今后，我们将继续举办此项评比活动，鼓励更多的学生选择公关专业学习，进入公关行业就业，关心上海市公关事业的发展。

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评比活动，让教育部门和各高校更加重视公共关系专业和对公关人才的培养，让学生能够得到更多的展示机会，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与支持，让上海的公关教育进一步走在全国的前列，为新时代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张黎明系上外附中67届英语2班的校友，曾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长、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现任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 游子 赤子 复兴之子

张 明

收到附中《校友通讯》的征稿邀请，诚惶诚恐。是写感激母校的师恩，还是写对附中生活的怀念，抑或是附中同学几十年的友谊？不知从何处下笔。正巧近日几位已定居海外的附中同学归来，聚会欢谈之余，突有感悟，权作为这次《校友通讯》创刊号献文的主题吧。

我是附中90届的毕业生，恰逢一个激荡变革的年代。国内，正值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浦东新区刚刚成立；国际上，苏东剧变后新的思潮不断出现，很多当时象我一样的青年学生也都在这个环境中不断观察、思考同一个问题：中国向何处走，个人如何追求自己的理想。

正是在这个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国门打开，出国留学成了很多学生的选择，甚至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作为在外语学习领域独步江湖的附中学生，当仁不让地走到了潮流的前列。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我们这一届的同学应该有一大半都有过海外留学、生活的经历。我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据我所知，以后的各届毕业生中出国留学的比例也不断攀升，附中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被外界誉为了“出国留学预备校”。

附中毕业后，我顺利考上了复旦大学法律系。经过四年大学的学习，我也选择了留学的道路，并考入了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研究科攻读商法领域的公司法硕士课程。庆应义塾大学在日本是与早稻田大学齐名的私立大学，学校创始人、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先生正是当初提出日本要“脱亚入欧”的代表人物。这所学校提倡完全的学术自由和积极接纳新事物新理论的开明学风，其法律系作为日本法学界数一数二的权威学术机构，拥有众多知名教授，确实是



令人向往的。

在日本学习期间，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能够在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的一流学府中深造，当时我的内心的的确确充满了敬畏。亲眼看到新干线的风驰电掣，百货商店里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精致商品，满大街几乎人手一台的移动电话（要知道那时在上海，手机似乎就是暴发户的代名词），学校每个课堂里都有的投影仪，图书馆里每个学生都可以随便使用的电脑、复印机……对于这所有的一切，准确的说，当时多多少少还是

有一些感慨的——如果我们的国家也能象日本这样先进该有多好。

正象鲁迅先生笔下的藤野先生一样，我在日本学习期间遇到的各科教师对我们这些留学生也都是和蔼可亲的。不过，渐渐的，我感觉到他们的这种和蔼，更多的似乎是出于对我的好奇和怜悯之心，因为他们对于中国还是有着很多的偏见。有时他们会问，中国真的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吗？你们的学校真的可以自由讲学吗？你们的法律是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吗？……等等等等。甚至于，在上破产法课程时，我向全班做了中国破产法的介绍，我们的教授好奇的问我，中国不是公有制吗？需要有破产制度吗？我的指导教师是留学德国的法学博士，言必称德国，随便讲个公司合并也是拿出戴姆勒奔驰的案例，完全不了解中国也有公司法和公司制度，更不消说当时中国已经存在的股份公司和公司上市的制度。

在与其他学校的留学生的交谈中，我也得知我的看法并不是孤立的，整个日本社会当时也许对于中国的认识就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一个不开放的没有民主制度的国家，他们唯一值得崇敬的是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但是现在，他们不再值得尊敬了。

包括我在内，也许当时并不是每个留学生都怀揣着报效祖国的高大理想，更多的还是考虑个人发展。但在这样一个外部环境下，自然而然的，不免都会产生“我们国家将来一定要超过你们”的不服气的抱负。

硕士课程完成后，我选择了回国加入中国的律师队伍。期间虽然有短暂的又一次回到日本并在日本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学习的经历，十几年中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上海见证了我们这个城市

我们这个国家大踏步发展前进的历史过程。因为业务关系，我更多的接触了从日本官员到企业经营者乃至普通日本民众的来华日本人，这十几年间，相对于日本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他们对于中国的经济腾飞和迅速进步，从赞许到惊叹直至现在近乎于无可奈何的态度转变，相较于二十年前我在日本求学期间的感受，真的是天壤之别。离开庆应义塾大学后，我再没有机会回去听过课，但我想，如果有机会再去听一次法律系的课，也许现在的教授就不会再讲奔驰的案例，而是讲吉利收购沃尔沃的案例了吧。

从附中毕业整整二十八年了，我们留学海外其他国家的同学回来，大家闲谈之余，都有着共通的感受，就是中国以及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二十几年前相比，真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在各自的职业领域和工作岗位上都不自觉的迸发出了更大的动力。

这样的变化，这样的感受，不但体现在我们自己身上，校庆日回到母校，看到学校崭新的校舍，精致的教学设备，敞亮舒适的宿舍，相比于我们当年艰苦的学习环境，一切也都发生了巨大的令人欣喜的变化。作为附中培养的学生，这二十几年，大量的附中学子从留学海外追求理想的游子，怀揣赤子之心回国创业，身体力行的实践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伟事业，可以说，附中学子不愧于称为我们国家的复兴之子。

（张明系上外附中1990届3班俄语班校友，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硕士，现为上海执业律师，上海市市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 情系上外附中 胸怀中华文化

张永龄



张永龄（右）与芝加哥总领事馆洪磊总领事、明尼苏达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惠天罡博士

1992年秋天，我和其他来自全市120多名小学毕业生佼佼者一起，走进了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我们在中山北一路295号度过了难忘的七年。那是印象深刻的七年，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哭，一起笑，也一起见证彼此的成长，从十多岁的孩子蜕变成宣誓成人的青年。走过花季和雨季，当骊歌响起的时候，我们在毕业典礼上相拥而别，泪中有笑，因为我们说过：SFLS 是一种血缘。

说上外附中是一种血缘一点也不错。大学毕业之后我开始了我的留学生涯，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北美，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能遇到附中的师兄师姐、学弟学妹们。他们在我的背包旅途上给过我温暖的沙发和咖啡，在世界的很多角落都给我留下过一个会心的微笑和一段美好的回忆。如果说附中的七年是impressionable years，那毕业

后的岁月才是真正的formative years，如同春芽，我们的成长由附中开始；如同橡树，离开附中后，附中的精神陪伴着我们一路茁壮。

附中的精神不仅体现在校门口金光闪闪的钱其琛部长书写的“培养外语外交人才摇篮”的题字，体现在“自强、至诚、志远”的校训中，更体现在每一个课堂里和每一位老师的谆谆教导里。我在附中的时候，《飞向远方》的校歌尚在襁褓之中。但歌词里写的“胸怀全中国，飞向远方”的美好愿景和伟大理想，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

我是一个语言学习的爱好者。在附中学了七年的英语和三年的德语，这两门外语现在依然是我工作和生活中的一部分。跨越太平洋，我的母语成为了一门“外语”。在海外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成了我的事业之后，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

每一段宝贵的附中经历，都是成就了今天站在国际教育、跨文化交流事业前沿的我的重要部分。

我在三个国家，读了三个大学并拿了三个学位；我学习过中国历史、环境教育和政治心理学；我教过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我似乎有很多出路。But you just know when the right call is made, 对于我来说，那个正确的选择有一个全世界都很响亮的名字：孔子学院。2012年，也就是从进入附中开始算起的第二十个年头，我开始在我的另一个母校，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担任孔子学院的美方副院长。从那一天开始，我觉得在我体内一直默默厚积的附中精神，开始蓄势地薄发了。

这并非夸大其词。在明大孔院的五年多的工作和生活里，我找到了附中在我身上刻下的烙印。我的孔院工作和我的附中学习经历有很多共鸣。明尼苏达州中小学的汉语全沉浸式项目闻名全美，《纽约时报》和《人民日报》都报道过。沉浸式汉语教学是一个需要先驱精神的伟大实验，不仅是在课堂上全部用汉语授课，而且还是用汉语这个目标语来进行包括数学、科学、社会学在内的学科教学。这种内容本位语言教学法（content-based instruction）也许不是朝夕之间就能被接受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沉浸式的教学并不陌生，而且是稔熟而亲切的。从进入上外附中初中预备班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小班教学的外语课上，我就没听到过一句中文，我的同学们在课余还孜孜不倦地用英语交流，在附中，这显得很普遍。我高一参加了一个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的物理课外兴趣班，兴许就是中国最早的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的尝试呢！

语言架起心灵的桥梁，文化让我们的灵魂能进行深入的沟通。要教好语言，文化要同步。在明大孔院的五年，我每年夏天都主持一项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名为“星谈”中文教师

暑期培训项目。我们的星谈项目关注文化，每年培训20名来自美国各地的中文老师，培训主题为“地道汉语文化教学与评估”（Teaching and Assessing Chinese Culture and Language Authentically）。在暑期培训的两个星期中，我的教学团队和中文教师们一起切磋，共同探讨如何把中文课堂设计得更加生动活泼、如何把中华文化的精粹更自然地融入汉语课堂，如何启发美国学生们更深入地去了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我的每一个“顿悟”的瞬间，都有一个上外附中的美好回忆。我们说外语教学要用真实语料，上外附中率先使用了英国语言教学专家Louis George Alexander 的Look, Listen and Learn 教材。相信每一个附中的校友都会对于这个3L倍感亲切，都会记得Clark 家的Sandy 和 Sue。我们说语言教学一定要辅以对于那些国家的文化介绍，虽然离开附中那么多年，但我还是能马上哼唱起当年学过的“*We Shall Overcome*”和“*On Top Of the Old Smokey*”这类在美国脍炙人口的歌曲。

文化教学要让学生全身心投入，那有什么能比得上附中的传统项目外语活动周（现更名为国际文化周）短剧汇演、歌舞大赛、知识竞赛、英语之星、以及我在校时候还未蔚然成风的口译风采大赛，每一个环节都提供了一个舞台，让师生们尽情展示自己的才华。谁又想到我这个毫无音乐天赋的学生也会鼓起勇气参加英语歌曲比赛呢？虽然那次歌唱比赛是场滑铁卢，但我从此不惧话筒，直到现在，还能带着一群美国高中生，一起欢唱TFBoys的《青春修炼手册》。在外语活动周中，我并不是最耀眼的那个；由此我们可以想象，每一年在那个群星璀璨的下午，在SFLS的舞台上有多少个演说家、歌唱家、文曲星、翻译家了。

说到翻译，那不仅是我最大的业余爱好，还是我在孔子学院工作中最得力的工具。附中的每一个外语老师都在语言的发展上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尤其是高中教我的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齐伟钧教授。还有我们的最有激情的历史老师吕锡哉。他那热情昂扬的“I shall die, I will die fighting for this cause”，每一个附中的毕业生都不会忘怀。每年孔子学院的年报翻译工作都是我负责的，带着一群研究生一起翻译，然后再逐字逐句推敲，力求做到最好。我也时常在明尼苏达大学的活动中客串翻译工作，包括给纪录片导演赵亮、书法家魏晋、画家熊岱平当翻译，协助他们给美国的观众讲好他们的中国文化故事。但我从未想到，有一天我可以站在能容纳800人，为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总领事、前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先生当翻译。

那是2016年10月8日，我职业生涯的一个亮点。在第四届明尼苏达州汉语水平考试颁奖典礼上，为了凸显明州学生的汉语水平，五位学生代表在台上和外交家用中文侃侃而谈。学生们的话题从中国小学生的日常生活，到跨太平洋协议，涉猎甚广。外交天团的睿智和声音担当洪磊先生在台上字字珠玑，而我的任务是要把那磁性的声音所表达的，用英文传达给台下坐着的那几百个不谙中文的学生家长。我从未如此紧张过，也从未如此兴奋过。活动结束后，这个让全国人民称道的职业外交家为我竖起了大拇指，让我从未如此自豪过。[placeholder for a quote from Consul General Hong Lei]，也许我不会成为一名职业外交家，但毫无疑问，我是一个文化的使者，我做到了“胸怀全中国，飞向远方。”

作为一个传播文化的人，我深知，如果不清楚自己的文化根基在哪里，那再优雅华丽的外语也是徒然。还记得1992年入学的第一天，阶梯教室里有一个大大的用毛笔写的“魂”字。当时并不知晓这个“魂”字的含义。后来慢慢明白

了，其中一个涵义是每年春季学期的民族魂活动。民族魂活动周和秋季的外语活动周遥相呼应，突出每一个附中学子对祖国文化渊源的展现。上外附中学生的外语水平人尽皆知，但其实民族魂活动对于学生一样意义深远。它如春风化雨般，把中华文化的底蕴早早地就刻在了每一个学子的心里；促使每一个远行的学子，都深深明白自己的根在那遥远的东方，自己是龙的传人。想起来，在90年代初，高考指挥棒下，哪怕是在教育界全国领先的上海，课外活动并不是一种常态。但是在附中的那七年中，尽管有繁重的学业，我们也从未失去过课外活动的乐趣。“四大名著”是我们的必读书目，读完之后可以读英文版，学生们也被鼓励去读英语世界名著的原版。在我们的寄宿生活中，从来就没有少过“闲书”。这恐怕是同龄人无法想象的吧。就我自己而言，附中的回忆，除了七年收获满满的知识和友谊，还有各种社团活动：《红秋千》校报、“青青草”文学社、辩论队、英文演讲比赛。那些活动，不仅陪伴了我的个人成长，还给了我一个永远可以回归的精神家园。

时光荏苒，离开附中即将20年，但附中于我的培育之恩，永生难忘。我兜兜转转了好多地方，来到了美国东海岸的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我有两个说着中文、英文和上海话的混血宝贝，我依然做着我最爱的中国语言文化传播工作；作为一家新建的孔子学院的美方院长，我将自豪地打造夏洛特特色的中国语言文化项目，树立起一个更好的孔子学院品牌。这一切，只因有你—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张永龄系上外附中1999届高三文科3班校友，现任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夏洛特分校孔子学院院长和外语系兼职教授。）

# 七五、七六届校友返校与老师们相聚

4月22日，在北京工作的部分校友重返校园与当年的老教师相聚、座谈，并参观了新校园。



图1 75、76届京漂校友和老教师合影  
图3 校友们在学校多功能厅举行座谈  
图5 在黄山三烈士雕像前合影

图2 束定芳校长在座谈会上介绍学校的发展  
图4 陆忠前校友在座谈会上



封面：为母校立的纪念石 摄影 薛万奉

封底：（从左至右）戚红星、朱榄叶、吴汉民、杨桂玲、薛万奉参与立石的同学，在竣工的纪念石前留影。